

汝信◎主编

# 世界文明通论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

## 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

左玉河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汝信◎主编

# 世界文明通论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

## 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左玉河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3  
(世界文明通论/汝信主编)  
ISBN 978-7-5334-5338-1

I. ①中… II. ①左… III. ①文化史-中国-近代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7762 号

选题策划: 孙汉生 汤源生  
丛书责任编辑: 汤源生  
本册责任编辑: 杨桂丽  
责任校对: 张 焱  
装帧设计: 季凯闻

## 世界文明通论

汝 信 主编

---

### 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

左玉河 著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 旭

发行热线 0591—83752790

印 刷 福州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 350002)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8

字 数 622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338-1

定 价 76.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 《世界文明通论》编委会

主 编	汝 信		
副主编	陈筠泉	陈启能	倪培耕
编 委	于 沛	马 勇	王逢振
	左玉河	叶渭渠	艾周昌
	孙汉生	吴云贵	邱永辉
	何星亮	汤源生	张椿年
	杨 深	姚介厚	郝名玮
	姜 芑	高 洪	徐世澄
	黄心川	钱敏如	钱满素
	秦惠彬	曹启璋	章国锋
	潘 光		

# 总 序

□ 汝 信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持的研究课题《世界文明通论》，经过二十余位学者的协力合作，历时五载，付出了辛勤劳动，其成果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继该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世界文明大系》和《世界文明图库》之后又一关于世界文明的多卷本专著。如果说《大系》和《图库》的目的是对世界上一些主要文明做分别的研究、介绍和论述，那么《通论》则试图从总体上对有关世界文明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并将中华文明纳入全球文明的视野，以三卷的篇幅做进一步的较全面的论述。在我国，关于世界文明的综合性的理论研究还刚起步不久，我们组织这一课题研究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世界文明的理论问题更多的关注。

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文明问题的研究兴趣日益高涨，在某些国家甚至有成为显学的趋势，这是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的。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科技进步带来了便捷的交通运输和通讯，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大大地缩短了人类的地理和心理距离，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性增强，整个世界越来越像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和平与发展

是我们现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而这两大问题的解决需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各方的共同努力，需要推进世界和谐发展。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金融危机造成的动荡尚未过去，地区战乱和冲突不断，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现象严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流行疾病等等，对人类生存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明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处理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挑战，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实际意义。如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和发挥作用，不仅要依靠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也需要有强大的所谓“软实力”，因此文明和文化的力量将对未来的世界发展进程起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由于人们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在当代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文明理论，有的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公众注意的热点，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萨伊德的“后殖民理论”以及曾鼓噪一时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主要在西方国家流行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有的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色彩，表现出妄想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意图。有的理论虽然对宣扬文化霸权的西方中心论有所批判揭露，值得借鉴，然而并不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因此，总的说来，当代西方各种文明理论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全面系统地研究有关世界文明发展的问题，建立科学的文明理论体系，仍然是有待于解决的一项迫切任务。特别是对我国学者来说，研究文明理论还必需紧密地联系中国的实际，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一切积极成果的同时，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制定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文明发展战略。这也是我们组织这一课题研究的目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研究不应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应从现实出发，以事实作为根据。文明理论亦应如此，纵观历史，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自古至今历时数千年，各个时代、各地区、各民族所创造的文明真可谓色彩缤纷，千姿百态，就像一个茂盛的百花园，使漫长的历史显得如此丰富而又精彩。文明虽然都是人类的创造，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有其共性，但由于客观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各种文明在表现的方式上却各有其特殊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不同面貌和彼此间的明显

差异。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看，文明的共性和文明的特殊性、多样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地统一的，其共性即寓于特殊性和多样性之中。有人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将会出现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以取代各个不同的文明，而各个文明所创造的文化也将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亦将逐渐消失。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但这不仅没有消灭各种文明和文化的差别，反而使它们获得新的活力而日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现在不同文明和多元文化的长久存在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199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认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的存在，并把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提出要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保持文化的多元化。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多样性提升到“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它是保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这两个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决议，不仅反映了当前世界文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表达了世界各族人民要求发展各自的文明和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的热切愿望。可以说，它们为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人类文明史昭示我们，既要承认各个不同文明的存在，又要看到不同的文明之间需要有经常的对话和交流，乃至相互吸收和交融，才能得到不断的发展。文明不是与世隔绝、孤立自在和自我封闭的实体，它需要与外部交往，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接触、对话和交流，从外界不断获得营养，吸取新的活力，焕发新的生机，才能发展壮大。一旦把自己封闭起来，断绝与其他文明世界的联系和往来，就会失去创新和前进的动力，变得保守僵化而走向衰落。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因此，世界文明整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不同的文明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文明之间的交流有很精辟的看法，他认为，文明既有能动性，能够不断演变，又有稳定的不变性。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相互传播和借用，即把自己的东西向外输出，又要借用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东西，但借用是有选择的，只借用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同时，文明又有“拒绝借用”的特性，即拒绝对自己不适用的东西，以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稳定性。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首先要注意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保持各自的主体意识，一方面不能认为自己的文明天生优越而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对其他文明也不能全盘照抄照搬，而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去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中适用于自己的优秀成果。归根到

底，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还是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明，彼此取长补短，谋求共赢。正是通过这种对话和交流，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各种伟大的文明得以世代相承，薪尽火传，犹如江河汇入大海，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见《一个自由人的崇拜》）如果说在过去的旧时代，文化交流曾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那么在国际联系和科技条件空前发达的今天，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更应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维护世界和平。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会议上所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sup>①</sup>这些话应作为我们今天研究文明理论的指针。

本课题的目标是，通过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探讨文明冲突、交融的特点和文明发展规律，从中华文明的实际出发，提出我们对文化和文明问题的系统看法，为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能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积极应对的文明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本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研究项目，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 A 类课题的资助，全书在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出版，谨此致谢。

<sup>①</sup> 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光明网，2000年9月7日。



# 引 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中华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华文明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代有损益，各放异彩。众多的文化遗存，浩瀚的历史典籍，蔚为奇观的艺术创造，独特的社会历史风貌，名垂千古的文化巨匠，构成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宝库。古代中国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地传承并发展下来，堪称世界历史的奇迹。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灿烂的时代。儒、墨、道、法、农、兵、纵横、小说诸家并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特别是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后，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儒家经典所确定的伦理纲常，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指导思想。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伦理等各个领域，以及各种流派，各种学说，都不能背离儒家经典。衡量政治的治乱得失，判断人物的功过是非，评判思想学说的正邪高下，观察社会风俗的醇陋优劣，都要以是否符合儒家经典所规定的纲常伦纪为标准。这样，儒家思想尤其是其所倡导的纲常伦纪，成为万古不变的“圣道”和人们遵循的社会规范。历久不衰、复杂多样的中

华文明结构，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以其统帅其他各个文化领域和文化形态。其明显的特点是：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概括而言就是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利。

中国古代文明虽然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也发生过数次变革，但其基本内核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儒家思想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发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鸦片战争以前，尽管也有一些外来文明传入中国，但它们不仅不可能取代中国传统文明的统治地位，而且连自己的独立性都难以保持。如果它要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下去，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明结合起来，被改造、被吸收，成为传统文明的补充（如东汉以来的佛教），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如明末清初的基督教）。中国传统文明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并与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它既有利于古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的政治统治和精神统治，同时也满足了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需求。只要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传统文明的深层结构就难有根本改变。实际上，进入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明，是在与周边文明冲突协调中相对独立地发展演进的。

西方文明主要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再经过以希伯来信仰为源头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演变过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不同，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差异更大。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不仅干预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并且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意识中。上帝是主宰，世俗的一切只能是神学的婢女，“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sup>①</sup>但从文艺复兴开始，资产阶级新文化猛烈冲击中世纪神学，教会权威急剧衰落，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复活，人文主义复兴。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迅速完成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变，发展为以民主、科学、人权、个人主义等理念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明。明清以后传入中国的西

<sup>①</sup>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方文明，正是这种比较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

由此可见，中西两种文明是在几乎彼此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地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中西方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立足点和核心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两者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特点，各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系统和独特的价值观念。两种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民族性差异。同时，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形成的西方文明，是一种代表世界文明发展趋向的近代文明。无论是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还是在人的精神自由等层面，西方近代文明均高于中国传统文明。它与中国传统文明不仅存在着民族性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为时代性的差异。

尽管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因两种文明在地域上相隔甚远，很难有发生冲突之机遇。但16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以强大的西方近代文明为后盾，开始了向全世界的扩张。这样，中西文明就像两条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逐渐相交汇流了。

西方近代文明的大举东来，是与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相伴的。欧洲殖民者携带着先进的洋枪大炮和廉价商品来到中国时，中国传统文明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仍在原有的轨道上徘徊。这就使中西文明的大规模相遇，是以一场激烈的冲突和震荡的方式来表现的。一方是挑战者，一方是应战者，一方咄咄逼人、步步紧逼，一方步步设防、逐渐撤退。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相遇后的此消彼长，展示着两种文明所处地位之逆转。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而且是独立的、连续不断的自成文明体系的，故中国传统文明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然后扩展到华北平原，进而扩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由于中原农业文明高于周边的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故尽管游牧民族一度征服过华夏汉族，建立过少数民族政权（北朝五胡十六国、元、清），但为了稳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不得不接受比自己高级的中原汉族文明，逐渐被汉族创造的华夏文明所征服。真正对华夏文明构成有力的挑战者，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通过罗什、达摩东来，法显、玄奘西访，通过取经、讲经、翻译、研究等方式，逐渐渗透到华夏文明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对中国的哲学、艺术影响较大，甚至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中华文明的主干和基本内核并没有改变，佛教逐渐

中国化，佛教的许多精华被吸纳入宋明儒学之中。因此，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并未遇到真正的强有力对手。中国士大夫及读书人从未想到在中华文明之外还有其他高等的文明，在中华汉民族之外还有可与自己相比肩的拥有高等文明的民族。这种文化心理上的优势是强固的，几乎偏执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西方近代文明不仅有中西古代文明所无法比拟的发达的科学技术，而且有着古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它是引领着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近代新文明，是远远高于中华古代文明的世界近代新文明。这种特性，决定了西方近代文明之东来，对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传统文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有力的冲击。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不仅使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人真正感受到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且使国人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真切地感受到数千年的中华古老文明陷入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之中。西方殖民者及其近代文明不仅没有被中华文明所同化，而是要来同化中华文明，要把古老的中国文明纳入到世界近代文明的新轨道和新秩序之中。

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使中华文明内部没有充分的时间酝酿和产生自己的近代文明，故中国近代文明不是从内部自然孕育和产生的，而是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经过中华古代文明的近代转型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文明的产生与形成，是与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及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密切相连的。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自然成为中国近代文明发展和演进的主要方式，也自然构成了中国近代文明演进的历史主题。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如果不遇着西方文化，中国本身并无多大问题。无如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个必然之势，于是问题乃起。如何调和中西文化，使西方文化进来而又不致推翻中国固有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sup>①</sup>这个“大问题”长期困扰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通过战争、暴力和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强行向中国输入。这样，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流与冲突，采用的便是“血与火”的暴烈方式。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围绕着三种矛盾展开，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

<sup>①</sup> 张东荪：《思想自由与文化》，《文史月刊》第1卷第10期，1937年1月20日。

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儒家文明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冲突显得格外猛烈和复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文明带着侵略、掠夺与奴役的烙印，逐渐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的确对封闭、守旧的中国传统文明给予巨大冲击，使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着古老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在激烈动荡与复杂多变的时代，西方近代文明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快速进入，打乱了中国社会的固有秩序，动摇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社会根基。中国固有秩序的崩溃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急于寻求文化出路，焦虑地寻求文化变革，并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对待中西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要么痛心疾首地加以否定，要么固步自封地予以坚守；对西方近代文明要么全盘抗拒，要么全盘肯定。这种复杂的而不健全的文化心态，使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历程显得格外曲折和坎坷。

晚清以降的中西文明冲突，最早体现为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的冲突，并且以“教案”、“反洋教”的暴烈方式逐次展开。两种文明的直接碰撞必然反映到国人的文化取舍和文化选择上。如果说晚清教案是中西文明直接碰撞与冲突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论争，则是西方文明输入后必然引起的中西文明冲突在中国朝野内部的集中反映。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明的逐步输入，两种文明的冲突按照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由片面到全面地展开：一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与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二是传统君主专制政体与近代君主立宪政体及民主政体的冲突；三是儒家纲常名教与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冲突。两种文明冲突的性质，不仅仅是所谓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古老的东方与近代崛起的西方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上的全面冲突，是传统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之争。

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之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激烈的争论，而且도存在着中西文明之间的沟通融合。如何看待中西两种文明的特质、地位和关系，成为困扰近代中国志士仁人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他们而言，如何认识中西文明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中国传统文明以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于是，晚清朝野相继提出了“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等沟通中西文明的思想主张。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中华文明的前途开药方，探寻中华文明在近代的新出路。

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明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但最根本的是文明的核心——儒家的纲常名教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由于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使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捆绑在一起，故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君主专制主义进行批判时，与其紧密相连的儒学也难免遭到质疑，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彻底崩溃。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力挑战和儒学独尊地位的根本动摇，中华文明面临着严峻的近代转型的使命。如何将中国传统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吸纳中西文明之长而创造出中国近代新文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肩负的重大文化使命。

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基本上是两个过程的统一：一是中华文明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自身蜕变与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影响其演变的速率与形式。二是西方近代文明随着欧洲帝国主义侵略而大规模输入中国，从而发生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因此，中国近代文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处理好“古今中外”问题。所谓“中”指中国传统文明，包括了“古”；“外”指西方近代文明，基本上代表了“今”。故“古今中外”的核心是“中”和“外”。所谓“古今”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现代化问题；所谓“中外”问题，就是中西文明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从而创建中国近代新文明。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乃为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特征。

由于中国传统文明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开始进行近代转型的，并长期困扰于古今、新旧、中西等纠缠不清的文化纷争之中，故“变”是中国近代文明演进的突出特点。正因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变动不居，致使国人在追求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找到构成中国近代文明的核心准则。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中国先进分子才真正形成了民主、科学、人权、理性及个性主义等现代文明的新准则。民主与科学体现了古今的今、中西的西、新旧的新，但又冲出了古今、中西、新旧的框架，也越过了体用、本末、主辅之争。民主与科学是体用并包的，同时也内涵古、中、旧的有用的内容。故民主与科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新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

中国传统文明在近代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和严峻的文化危机，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复兴机遇。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不是儒家思想的复活，而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必须建立在中西文明沟通与融合的基础之上，必须寻找中西文明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将西方近代文明的新

枝，嫁接到中国传统文明的老根上。这是需要几代中国人完成的任务。遗憾的是，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没有能够在近代中国完成，而是落在了当代中国人的肩上。肩负着中华文明复兴使命的当代中国人，需要沿着前人的思想轨迹，在文化理论上开拓创新，继续进行中西文明的沟通与融合工作，继续创建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新文明。

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如何接受西方文明而不被同化，如何在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时与国际社会接轨，如何将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之中而创建中国的新文明，显然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异常紧迫的伟大任务。

#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华文明结构的变化	1
一、西方器物文明的输入/3	
二、西方制度文明的介绍/13	
三、西方近代文明的全面涌入/22	
四、西学东渐对中华文明的强力冲击/32	
五、中华文明基本结构的变化/36	
第二章 晚清时期的中西宗教文明碰撞	45
一、明清之际中西文明的最初相遇/46	
二、反洋教背后的文明冲突/59	
三、冲突流言传播与文明之间的误解/72	
四、“灭洋”背后的文化情结/78	
五、“孔子加耶稣”模式/85	



<b>第三章</b>	<b>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论争</b>	<b>97</b>
	一、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研习天文算学之争/97	
	二、修筑新式铁路之争/104	
	三、民权论与君主专制的冲突/107	
	四、平等观念与纲常名教之争/114	
	五、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争/119	
	六、“欧化”与“国粹”之争/124	
<b>第四章</b>	<b>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b>	<b>134</b>
	一、《新青年》派与《东方杂志》派之争/134	
	二、新旧思想能否调和之争/145	
	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发的论战/153	
	四、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161	
	五、“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169	
<b>第五章</b>	<b>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b>	<b>179</b>
	一、“西学中源”说的提出/180	
	二、“西学中源”说内涵的扩大/188	
	三、“西学中源”说的两面性/197	
	四、“中体西用”论的最初表述/203	
	五、“中体西用”论的经典表述/208	
	六、“中体西用”论的影响/211	
<b>第六章</b>	<b>从“醉心欧化”到“全盘西化”</b>	<b>221</b>
	一、欧化思潮的兴起/221	
	二、胡适与“全盘西化”的提出/231	
	三、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241	
	四、“现代化”共识的形成/255	